

影响浙江私家藏书楼发展的几个因素分析

赵美娣 叶杭庆

(浙江大学图书馆,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在浙江的各类藏书楼中,私家藏书楼是成就最高最值得骄傲的。藏书楼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有着必然的联系,文章从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地理人文等因素进行分析,就它们与浙江私家藏书楼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藏书楼; 浙江; 政治; 经济; 文化; 地理; 历史

1 浙江省的私家藏书楼概说

私家藏书楼是指民间私人贮存藏书的处所,或斋室,或阁楼。私人藏书的历史稍晚于官府藏书,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学术下移民间,百家争鸣、诸子竞说的较为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氛围,为早期私人藏书的滋生提供了条件。浙江省素有“文物之邦”的美誉,藏书之风更由来已久。在浙江的各类藏书楼中,私家藏书楼是成就最高最值得骄傲的。境内有籍可考的藏书家可上溯至三国两晋时期。此后,私人藏书绵延不绝,至明清,藏书楼之多,规模之大,质量之高,分布之广,几为全国之最。

根据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的统计,到清朝为止浙江有名可稽的藏书楼有一百八十余所^{〔1〕},顾志兴在《浙江藏书家藏书楼》中重点介绍了近80个藏书楼^{〔2〕}。我们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按浙江不同地区分布的藏书楼,杭州地区有100余个,湖州地区有40个,嘉兴地区有120余个,宁波地区有90个,绍兴地区有30余个,金华地区有30余个,温州地区有20余个,台州、衢州、丽水等地区近30余个,浙江有名可稽的藏书楼不下460个^{〔3〕}。从藏书楼的地域分布来看,主要分布于浙北和浙东地区,这与这些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交通便利,官宦、文人聚集较多等因素有关,但地处浙南的温州地区和浙西的金华地区在私家藏书楼的建设中同样不容忽视。从时间分布来看,大约四分之三的藏书楼建设于清朝以后,占了绝大多数。浙江的私家藏书楼自两宋开始有较快的发展,在清朝达到鼎盛。

藏书楼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有着必然的联系。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决定了当时当地不同藏书楼的发展速度、规模和形式,反之,藏书楼本身则因其所包含的特定文化内涵对社会产生反作用。浙江的私家藏书楼在我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收藏丰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收集、研究典籍的过程中,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丰富了藏书理论,又提供了藏书楼建筑、图书保护等方面的经验。还有许多藏书楼的典籍刻印,在传播和保护图书文献的活动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 政治经济因素对浙江私家藏书楼的影响

政治经济因素是影响浙江私家藏书楼发展最主要的因素。这从浙江整个私家藏书楼的发展轨迹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浙江私家藏书的起源应该基本上与中国整个藏书史同步。但我国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黄河流域地区和北方,而浙江则属于南蛮荒凉之地,所以在宋朝以前整个藏书事业均落后于北方,虽然有沈约、吴越王钱氏及其后人等著名的藏书大家,总体上私家藏书还不成规模,也少见有专为藏书建筑楼室的藏书家。当然这主要是受当时的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在以抄本书为主的时代,图书本来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05WZT028)“浙江藏书楼史”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信息: 赵美娣,女,副研究馆员; 叶杭庆,女,副研究馆员,理学分馆馆长。

就是稀少之物,由皇室官宦人家掌控居多,远未普及到普通人家。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和推广,大量印刷版图书开始流通,才为私家藏书的发展创造了最主要的条件。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南宋正式迁都杭州,使杭州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由于南宋政权转移到江南,大批宋朝人才南迁,又一次带动了南方的发展。中原人口大量迁入,江浙一带的工商业繁荣居全国之冠,浙江的藏书楼此时开始大放光彩了。在其后一直到清朝的数百年时间里,虽然杭州随着南宋的灭亡失去了首府之位置,盛极一时的官府藏书楼也如昙花一现似地很快黯然失色,但私家藏书楼却一枝独秀,一直走在全国之首。

从整个藏书楼的发展史看,安定的政治局面,可以为藏书事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动荡和战乱,则必然给藏书事业带来极大的破坏和损失,官府藏书楼如此,私家藏书楼同样如此。浙江私人藏书楼发展比较快的时候,都是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时期,如两宋时期,北方战乱比较频繁,而南方相对安定,明清两代藏书楼大发展的时候也正是政权稳定的时候。另外,统治者对藏书事业的重视和支持程度,同样影响着藏书楼的发展。宋、明、清历朝的帝王都是比较重视和支持藏书事业的,在向民间搜寻图书的过程中,对于献书的行为和人员给予高度的表彰和奖励,这无疑鼓励并促使了私家藏书楼的发展。特别是清中叶,乾隆修《四库全书》,杭州鲍氏“知不足斋”、汪氏“开万堂”、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汪氏“振绮堂”、宁波范氏“天一阁”都以献书多而获奖赏,乾隆对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浙江的“知不足斋”、“开万堂”和“天一阁”都获得了这一奖励,闻名全国。乾隆还将宁波天一阁作为皇家藏书楼建筑的范本,浙江的私人藏书楼在全国声名远扬。

当然,藏书楼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私家藏书楼。图书作为一种物质产品,藏书活动必然与图书的生产过程发生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竹简、丝帛、纸张、笔墨的生产水平以及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图书装帧的技术水平。竹简和丝帛时代,因这些材料的笨重和昂贵,不可能大量生产和流传,私家藏书楼就难以有大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应用以后,才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而浙江又是全国雕版印刷的中心之一,大量图书的雕印出版,极大地丰富了藏书家的收藏,这也是明清时期浙江私家藏书楼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藏书事业和藏书楼的建设,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前提条件。浙江在隋朝大运河修建以后,与北方的经济、文化和商业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经济发展逐渐走到全国之前,特别在南宋定都以后,浙江地区就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枢纽地带,无论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在全国都首屈一指。这种相对全国较为发达的社会经济,为藏书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3 学术文化因素对浙江私家藏书楼的影响

一个时代和地区的学术风尚是影响藏书与藏书楼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学术研究和风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藏书楼收藏典籍的内容。佛道盛行之时,大量的佛经道书成为藏书楼的藏品,唐宋诗词繁荣,藏书楼不仅大量收藏,还在编辑、校雠、传播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小说、戏剧的发展,同样在藏书楼的收藏中反映出来。官府藏书楼由于受统治者影响,收藏的主要目的是为统治者巩固政权服务,需要考虑到引领典籍的收藏导向,起到学术倡导的作用。而私家藏书楼则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和客观性,受藏书家个人的学术取向和社会大环境以及学术文化的影响更大。

学术风气影响着藏书活动和藏书楼的发展,而藏书楼的兴盛与衰落也深刻地影响着时代和地域的学术文化,成为一个地区文化、学术盛衰的标志。藏书楼对浙江人文环境的塑造,对当地学术文化的孕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浙江在两宋以后,因为有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浙东学派等诸多思想流派形成和发展,活跃的学术思想促进了浙江藏书楼的繁荣。梁启超和蔡尚思在论及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发展史的著作中,都明确地把藏书和学术研究联系起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梁启超就专门表彰了明末清初的私家藏书活动对学术界的巨大贡献,称藏书家们的工作是“给后来学者很有益的工具”⁽⁴⁾。蔡尚思则把明末清初浙江藏书活动的鼎盛归结为清代“浙东学派”形成的原因之一⁽⁵⁾。综观整个学术思想史,所有成果的产生无一不是在利用藏书进行阅读、探索、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以著述、学派等形式进行传播。唐宋诗词、宋明理学、清代考据这些文化精华,大多是学者们利用自己积累的图书,以及从大众文化吸取的材料而酿造出来的。浙江的许多大学问家同时也是藏书家,如作为爱国诗人和文学家的陆游,文献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胡应麟,被张元济称为“吾邑第一读书种子”的文学家胡震亨,集大成者的学问家黄宗羲,被尊为“一代文宗”的朱彝尊,博学多才的杭世骏、全祖望等等,他们在我国藏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字。还有张廷济蒋光煦的校勘学、陆心源的版本学、万斯选的理学、万斯大的经学、万斯同的文学、章学诚的经史、孙诒让的博学等等,这些学术大师穷毕生精

力,名篇迭出,他们同时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家有藏书楼作为其做学问、搞研究的后盾,利用藏书的巨大支持而各铸辉煌,名重文坛学界。

4 浙江的地理人文因素对私家藏书楼发展的影响

浙江拥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的盛名,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从东晋南朝以来就后来居上,其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也是形成浙江藏书楼繁荣的一个原因。浙江人具有富于冒险、开拓进取的海派文化传统,他们善于汲取融合各种先进文化和技术,不但容纳了中原文化的精华,而且不失时机抓住西学东渐的契机,既有勇于创新善于进取的精神,也有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色彩。浙江人头脑灵活精明,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这种特点在藏书家身上也有体现,并且从某些方面促进了私家藏书楼的发展。浙江人善于吸收别人先进思想,敢于领潮流之先,所以古越藏书楼这样由私人兴办的开放式藏书楼能够在浙江首先出现也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在浙江的藏书楼发展中,同样也体现出浙江人功利性较强的特点,在藏书收藏或藏书楼建筑方面追求名声,以自己的收藏获取统治者的表彰。如乾隆修《四库全书》,进书 500 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全国得到这一殊荣的藏书楼仅 4 家,而浙江占了四分之三,无疑成为浙江藏书家的骄傲并使众藏书家趋之若鹜,地方官员更是视其为盛事。有些藏书家对藏品的价值和保值十分看重,如项元汴的天籁阁以收藏字画古董和善本图书著称,但每得名迹,即遍钤以收藏印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有“十斛明珠娉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之叹;项元汴还在所得画幅书卷之后记上收购之价,其意在愿子孙长守,即或出售,也应在原价上有所增值。故后人颇对集博藏好古之雅和逐锥刀之利的商贾之俗于一身的项元汴感到不可理解并多有讥讽。另外如读书作官的心态,把藏书—读书—做官联系在一起,也就成为藏书楼建设的动力。许多学子之所以要藏书读书,是为了“状元试三场,一生用不尽”。这种读书做官的藏书心理,有时候是数代人奋斗的目标,即父辈藏书或祖辈藏书,留与子孙去读书做官。一些藏书家把藏书作为衣食之外的第三份家产,传与子孙读书做官。他们认为传书优于传财,过多的钱财会使子孙沉湎于享乐之中,反生祸害,而书籍却能使之益智,建立功名,是有益无弊的。

浙江的地理环境使其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物产,浙江人善于经商,其人文商品经济也相对发达,形成和扩大了文化市场,使书籍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有了广泛的流通渠道,极大地方便了藏书家的收藏,也刺激了书籍的印刷业和出版业。这种良性循环,无疑是私家藏书楼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 (1) 吴晗. 江浙藏书家史略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2) 顾志兴.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3) 浙江文化信息网. 藏书楼 (EB/OL). 2006-08-06. <http://www.zjcnt.com/zt/cangsh/page1/no1.htm>.
- (4)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 (5) 蔡尚思. 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